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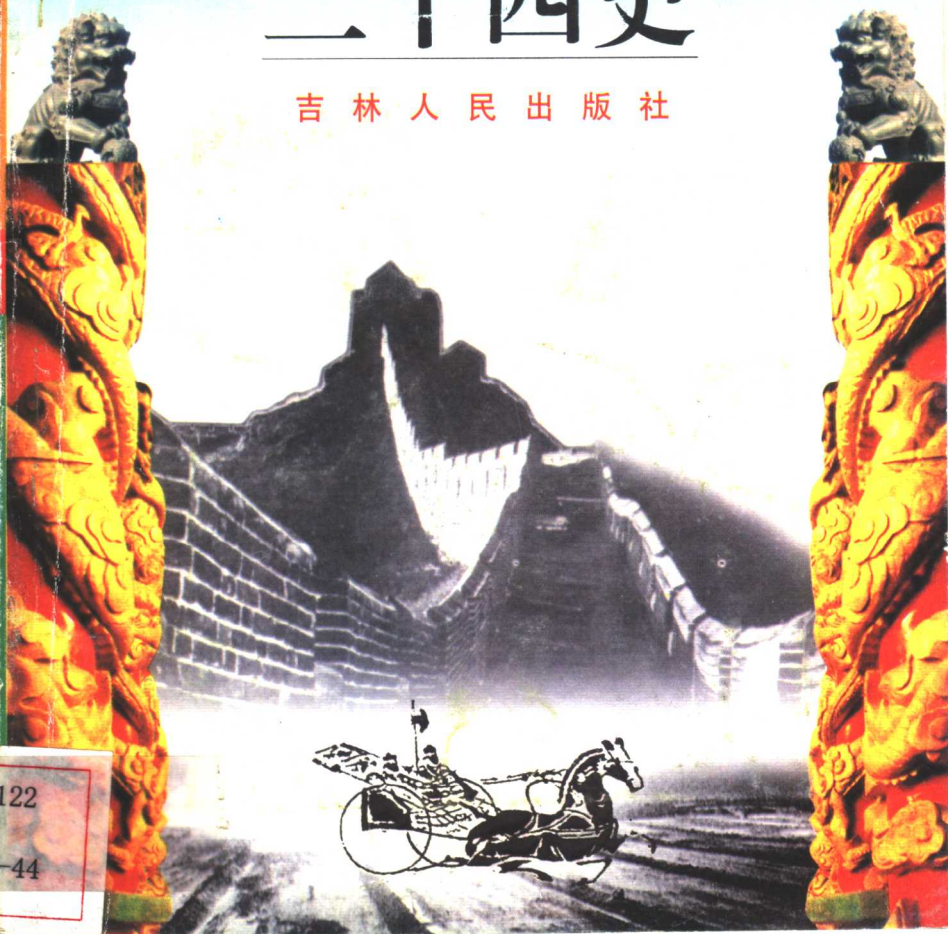
中 / 国 / 传 / 统 / 文 / 化 / 知 / 识 / 小 / 丛 / 书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ZHISHIXIAO
CONGSHU

44

八股文 二十四史

吉林人民出版社



122

44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八股文

罗冬阳 编著

二十四史

刘国石 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	胡维革	
副 主 编	陈立忠	胡晓岩 郝国昆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晶娜	田毅鹏
	厉永平	李书源
	陈立忠	陈虹妮
	周玉和	郝国昆
	胡晓岩	胡维革
	赵永春	程舒伟
	雷 庆	颜震华
	魏克威	
责任编辑	刘慧杰	

目 录

八股文	(1)
一 名繯利锁话八股	(1)
二 经义、杂剧与八股	(7)
三 规模初具	(10)
四 以古文为时文	(18)
五 力求灵变	(22)
六 借题发挥	(25)
七 朴学风气	(30)
八 选本、选家与文社	(34)
九 八股文的没落与废除	(39)
 二十四史	 (45)
一 集不朽名著 聚二十四史	(46)
二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48)
三 以断代为限 撰一朝之史	(55)
四 革依时为序 创同类为准	(59)
五 分述三国史 合为一部书	(61)
六 承断代史体 间有所变异	(63)

七	约南北八书	成南北二史·····	(69)
八	开官修之例	启后代之统·····	(70)
九	扬民族文化	弃封建糟粕·····	(89)

八 股 文

说起八股文，人们都很耳熟，它是空洞无物、千篇一律、教条化、形式化的代名词。不过，若细问起八股文原本是什么，恐怕就只有少数人能说得上来。所谓八股文，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是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这种形式是死板的文体，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同时，它又是封建知识分子博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

一 名缰利锁话八股

读书人，古代又称为士。士是四民之首，群雄逐鹿的年代，谁能充分借力于他，谁就能确立对天下的治权；天下太平的日子，能否笼络住他，则是皇朝治权能否永久的关键。逐鹿的年代，鹿死谁手尚无定论，群雄大都无力培养自己的士人，只能就现有者征求。一旦胜者为王，建立新的皇朝，便要以教育、取士诸手段来培养、选拔人才，并将士人的思想与行为束缚在绝对有利皇朝统治的轨道上。

八股文对读书人的束缚是双重的。从形式看，它有严谨的格式要求；从内容讲，它不得逾越程朱学说的雷池半步。因此，它被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当作衡士的圭臬，奉行不替。

明清科举考试中的乡试和会试，都要考三场。头场考《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考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三种文体中任选一道；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表面看来，似乎三场的考试对读书人的命运都至关重要。但是，由于考生众多，试卷山积，考官人少，阅卷时间短促，考官们只认真批阅头场的试卷，在头场中，又只重《四书》义。所以，实际上决定读书人命运的是《四书》义，当然，《四书》义在科举考试中便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四书》义，又称《四书》文，就是八股文。

称《四书》义，是就它的内容来说的。《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原本是《礼记》中的两篇，《论语》、《孟子》则是单行的儒家经典。南宋大儒朱熹为了方便表述理学的理论，便将它们汇编到一起，加以注解诠释，称《四书章句集注》。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定科举程式时，规定以朱熹的这部书作为取士的标准。《四书》义的题就从四书中出，而考生答题必须恪守朱熹的注解，不然就是离经叛道，要遭处罚。

当然，从内容方面把八股文归结为《四书》文是欠准确的。因为它还包括五经义。明朝的科举程式规定，五经义的考试也必须以理学家的注释本为准。而《四书》只是儒家经典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将它称为经义更准确一些。不过，在明清的科举考试中，《四书》文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五经义。这与《四书》在理学中的地位比五经远为突出的状况也是一致的。因此，习

惯上以为，八股文就是《四书》文。清乾隆皇帝初钦选八股文时，也只选《四书》文作为范本，因而定名为《钦定四书文》。

称八股文，是就它的形式来说的。因为科举的最高级考试——殿试是由皇帝主持的，习惯上称为制科，所以，八股文又称为制科义，简称制义或制艺。与古文相对，它又被称为时文。但八股文则是它最为人们广泛知道的名称，而这一名称也抓住了它作为一种独特科举文体的形式特征。

作为一种独特文体，八股文也有自己的渊源与流变。不过，在弄清它的渊源与流变之前，最好先对典型的八股文有个印象。有了典型作参照，才好弄清它的渊源所自，流度所向。

被八股文作家奉为楷模的是明成化（1465—1487年）、弘治（1488—1505年）时期的八股文，尤其是王鏊的作品。

王鏊（1450—1524年），字济之，又字守溪，江苏吴县人，成化十年（1474年）应天乡试解元，次年会试令元，殿试探花。后来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清朝人对他的八股文评价甚高。俞长城说他的八股文理实、气舒、神完、法备，他在八股文上的地位有如司马迁在史学、杜甫在诗歌、王羲之在书法上占有的地位。

王鏊的八股文不但作得好，而且对弘治、正德时期的读书人影响很大。他多次主持乡试，“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经术，险诡者一切屏去。弘、正间，文体为一变”。

他持传世名作《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一文，清乾隆时被收入《钦定四书文》。著名学者方苞评论该文说：“层次洗发，由浅入深，题义既毕，篇法亦完。此先辈真实本领。后人虽开阖照应，备极巧变，莫能继武也。”大有后人不可及的感叹。下面就以这篇不可及的作品为例，看一看八股文的模样。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破题）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承题）

盖谓：

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

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原起）

诚能

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

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

则：

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

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

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府育者无忧矣。

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前股）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过接）

吾知：

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廩而后为吾有也。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

足乎！

饗殯牢醴，足以供賓客之需；車馬器械，足以備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應之也，又孰與不足乎！（後股）

吁！徇法之立，本以為民，而國用之足，乃由於此，何必加賦以求富哉！（大結）

八股文的結構，作法，要依題目的類型而定。八股文的基本題型有三種：單句題，即以《四書》中的句子作題目，當然也可以二句三句為題；通節題，即以一節為題；全章題，即以一章為題。這些都屬於平正的題目。而这三類的基本題目，又可依據它們的句法、詞法與語義結構，分為雙扇題、三扇題、三扇遞進題、四扇題、五扇題等等。所謂扇，就是基本的句法、詞法或語義單位。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論語·憲問》）就是典型的雙扇題。

王鑒這篇八股文的題目“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出自《論語·顏淵》的第九章第四節，屬單句雙扇題。題中百姓與君相對，足與不足相對。作法，有分作、合作、先分後合等等。王鑒採用的是合作法。

先以二句破題。所謂破題，即是破開題字或題意。不管題目長短、類型如何，首先必須以二句概括題意。若破題中出現人名，必須用代稱，例如用聖人代指孔夫子，能人代指孔夫子的學生，等等。

然後是承題三句。承題的作用是引申破題的意義。也可用四句、五句。承題中的人名直稱本名，故文中稱有若。

接着是原起，提出有若為何而發此言。原起又稱起講，這

里以“盖谓”开头。视具体情况，也可用若曰、意谓、且夫、今夫、尝思等词。“盖谓”以下，用有若对袁公说话的口气，这就是所谓“代圣贤立言”。口气的运用，依题目而定。不涉及对话的事实题、义理题，不用口气。

起讲以后，是本文的主要部分。前股先以六比合说民富君足的道理，中间以两句过接，点出题目，后股又以六比合说。前股与后股的结构相同，每六股中，两股为一对，共三对。三对的文字，形式上是繁、简、更繁，后股字数多于前股；意义则层层递进，后股比前股更为深化；气势则舒紧节律鲜明，后股高过前股，一气呵成。

最后是大结，紧扣题意，而又申述作者的见解。

股的本义是指人的大腿。在正常情况下，人的大腿是一对，因而引申为对句、偶句。股又称比。在文章选家的词汇里，股除了指称对句中的两大组成部分中的一部分（可以是单句，也可以是排比句，或是一段文字）外，还指称文章结构中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起股”、“中股”、“后股”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而这个意义上的股有时又被称为幅。为了分析文章结构的方便，有时用“比”来指称偶句中的一联。

八股文中偶句的数目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可以依题目的长短，作六股（联）到二十股不等。王鏊这篇文章的前后二股（幅）中共用了十二股（比、联）。八股是概略而言。

八股的名称，则来自成、弘时的八股文。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题，文中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比、联），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再收四句，最后作大结。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题，文中也是起讲先提三句，接着就讲责难于君之意四股，

中间过接二句，再讲谓之恭之意四股，又收拢二句，最后作大结。每两股，在构思上是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上半篇与下半篇的布局结构相同。前后共八股，故有八股文的称谓。

上面介绍的是八股文的基本结构。但题型不同，谋篇布局的方式也千差万别。除破题、承题、起讲外，以下的布局可随题而定，大体不出领题（由上文领到本题）、起股（又称起比、题比）、出题（点出题目）、中股（中比）、后股（后比）、束股（束比）、大结（或落下）几部分。有的大结前尚有一收结。清代乾隆至嘉庆初期，以为大结可以隐藏舞弊的暗记，禁止用大结，因而收结就成了八股文的结尾。其实，舞弊的暗记于文中任何文字上都可设置，所以后来又恢复了大结。

八股文的要害则在于：内容上的“代圣贤立言”与形式上的“体尚排偶”相结合，旨在禁锢读书人的思想，销铄他们的个性，驯服为皇朝的忠实奴仆。

二 经义、杂剧与八股

看了典型八股文的模样，知道八股文的要件有二个：一是“代圣贤立言”，内容局限于经程朱理学重新解释了的儒家经典；二是“体尚排偶”，形式与布局有特别的讲究。沿着科举制的历史往回追溯，则两者在宋代的经义中已具端倪。然而，要理解经义为何会成了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便不得不更向前一步上溯到唐朝。

唐代科举分科取士，其中以进士和明经两科为要，尤以进

士出身为贵。进士科考诗赋，明经科试帖经。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不需基层政府的推荐，而是由本人到州郡“投牒自应”。古人有言，“上有所好，下必甚之”。科举既以诗赋取士，歌咏吟唱便成一代文人风尚，诗歌以唐代为盛，与此不无关系。然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毁灭了大唐盛世。事后，人们反躬自问致乱的原因，矛头之一便指向科举制。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太常少卿杨綰上疏请停进士、明经取士。他认为当时的科举制有二大弊病：一是用诗赋取士，士子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传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尚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更莫谈遵循孔子的教诲去做一个君子之儒了。二是“令投牒自应”，没有德行的限制，士子以奔竞为务，“矜艺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投刺干谒，驱驰于要路；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为了选拔德行兼备的人才，他建议废除诗赋取士与投牒自应的制度，恢复“乡举里选”，士子由县令察举推荐给州，而后州荐之于省，试以经义和策问。杨綰提出的科举改革构想，为晚唐和北宋的政治革新家付诸实践，终于使经义成为取士的主要科目。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规定：进士科废诗赋，改用帖经，略问大义，同时还要考议论。又规定，公卿士族子弟必先入国学方许应举。尽管停诗赋只有太和八年一科，但这种做法却是宋代经义取士的先行。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范仲淹等人推行新政，规定士子必须在地方官学或国子监听读一定的时间才许取解参加科举考试，以使士子们“专心经术”。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废除诗赋与墨帖，改用经义试

士，并在1075年颁其所注《诗》、《书》、《周礼》三经新义于学宫，以实现“一道德”的目的。

王安石的变法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洛党的强烈反对，终归失败，但司马光对罢诗赋、崇经义的改革，则深表赞同。他说：“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罢诗赋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他所反对的是王安石“以一己之学取士”。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科举考试中经义与诗赋两科并存。南宋庆元党禁解除后，程朱理学取得了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提供了完全以经义取士的可能。元代，理学得到广泛传播，终于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程朱理学占据了取士的统治地位。皇庆二年的科举诏规定：“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用《朱氏章句集注》。……汉人、南人，第一场明经经题二问，《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复以己意结之，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各治一经。《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已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

明洪武三年（1370年）、十七年（1384年）所定科举程式，基本沿袭了皇庆诏书中有关汉人、南人的考试内容。三年规定第一场考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十七年规定先考《四书》义三道，再考经义四道，加大了题量，提高了《四书》义的地位。

考察了科举考试内容的演变，可以明了，八股文从内容上看，其实就是宋元以来，经义和明经的继承和进一步的发展。

八股文“体尚排偶”的形式，在宋代的经义已见端倪。口气的运用，从文天祥《愿比死者一洒之》文，可见初期的形式。而杨万里《国家将兴必有祯祥》文，点题后用“以为”二字起，《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文，点题后用“谓”字起，更类似代言语气。

清代学者焦循认为，八股文入口气代人论说，实源于金、元时代的曲剧。破题、起讲，等于曲之引子，提比、中比，等于曲之套数，夹入领题、出题段落，等于曲之宾白。而毛奇龄则更将八股格式溯源到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律诗。

清咸丰九年（1859年），江国霖在为梁章钜《制义丛话》所作的《序》中说：八股文“指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之博，持律如诗之严。”清代科举最后一科的探花商衍鎤先生说，“究之束缚过于策论，措词隘于诗赋”。可见，八股文的形式，是受我国文化史上多种文体的影响。在明代，由科举考试的主管部门根据考试的目的、技术的需要和文场的风尚而确定下来的。

三 规模初具

八股文虽然受着内容与形式的双重限制，不过它既然是读书人笔下涂画出来的东西，自然不能像干旱沙漠中的木乃伊一般没有气候变迁的影响。同是一八股文，随着时间的推移，因政治与思想诸因素的变化，其形式与内容也有一些变化和不同。

从明初到成化、弘治的百余年间，是八股文演进的第一期。这一期的八股文，内容上与思想界拘循程朱矩矱(yuē)的风气相同，都是恪遵传注，谨守绳墨，尺寸不渝；形式上则有一个

从不齐到整齐的演进。

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朝举行中断科举11年后的首次会试，会元是江西分宜人黄子澄。他的头场《论语》义《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文，是明代八股文的初式。文云：

治道隆于一世，政柄统于一人。（破题）

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礼乐征伐皆统于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何哉？昔圣人通论天下之势，首举其盛为言。（承题）

若曰：

天下大政，固非一端；

天子至尊，实无二上。（起讲）

是故

民安物阜，群黎乐四海之无虞。

天开日朗，万国仰一人之有庆。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

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前股）

非天下有道之时乎？（过接）

当斯时也：

语离明，则一人所独居也。

语乾纲，则一人所独断也。

若礼若乐，国之大柄，则以天子操之而掌于宗伯。

若征若伐，国之大柄，则以天子主之而掌于司马。

一制度，一声容，议之者天子，不闻以诸侯而变之也。

一生杀，一予夺，制之者天子，不闻以大夫而擅之也。

皇录丕振，而尧封之内咸慄圣主之威严。

王纲独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后股）

信乎，非天下有道之盛世，孰能若此哉！（收结）

这篇文章已很讲究排偶。破题、起讲用的都是偶句。而正文的前股用了四比，后股用了八比，整整十二比。这篇文章的作法是先用四比讲“天下有道”，中间用一散句过接，然后用八比讲“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最后用一散句收结。文字流畅，紧扣题意。才子解缙评论此文说：“庄重典雅，台阁文字。”如果把它与王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一文作个对照，就会看出，此文在整体的布局上不如王文整齐。王文前后股都是六比，结构相同，显得很规整；而此文前股用四比，后股用八比，结构上就不对称了。由此也可见，明初读书人对文章格律并没有达到刻意追求的地步。其实，在实际的八股文写作中，或对或散，也并没有固定的格式。

明初八股文的题目，都是选取经书中的大道理大制度与人伦治道密切相关的部分，单句题很少，由出自不同章节的词句组成的截搭题就更不可能有了。

自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会试中出了《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题后，洪武三十年（1397年）、建文二年（1400年）二科会试中又接连二次出现同一题目。为什么同一题目在会试中一再出现，并且连续出现呢？因为这个题目是朝廷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原来明太祖害怕皇权落到异姓大臣的手中，想尽办法阻止出现权臣，并且着力培植朱家子弟的势力。办法之一就是捡起已被历史淘汰了的分封制。明太祖分封诸子为藩王，当然遭到有见识的儒臣的反对。不过他听不了反对意见，仍是一意孤行。结果，到洪武末年，藩王的势力坐大。尤其是北边